



【编者按】《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276 期介绍了姚大力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有读者建议《通讯》介绍汪荣祖教授对于相关主题的文章，以便启发大家思考。在学术议题上，学者之间出现不同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因此本期《通讯》介绍几篇汪荣祖教授的论文，供大家参考。再次声明，《通讯》只是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学术信息，所介绍的文章绝不代表《通讯》编者的立场和观点。（马戎）

## 【论 文】

# 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sup>1</sup>

汪荣祖<sup>2</sup>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于短期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国防与科技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成就与进展，俨然已经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展望新时代中国学术的未来，自然科学迎头赶上西方，指日可待；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仍然遥遥跟随西方，未能自主。原因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客体”（objectivity），无论声光化电，不会有文化与价值判断，有其相当“普世的”（universal）认知，不因地区或文化之异而有差别，也就不太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所说，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在环球为家，因为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理性社会之国被传授到另一个理性社会之国<sup>3</sup>。

其实早在 17、18 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就已出版了名著《新科学》（*Scienza nuova*; *New Science*, 1725），将“心界”（world of minds）与“天界”（world of nature），或“外知识”（outer knowledge）与“内知识”（inner knowledge）做了区别。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sup>4</sup>。他提升了心智之学，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心智之学虽也有其“客体”，如历史事实，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subjectivity）。换言之，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性。所以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内所谓的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同一史实，但有不同的观点、解释与意义，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人文学科对外界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见于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才是客观。然则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不能不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自 20 世纪之初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极其昌盛，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对科学盲目崇拜，形成不太理性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学也力求科学化，如英国史家贝雷（John B. Bury, 1861-1927）所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sup>5</sup>，但是贝氏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

<sup>1</sup> 《国际汉学》2018 年第 2 期，<https://mp.weixin.qq.com/s/q-l7OXFPAIt580TkLkt3og>

<sup>2</sup> 作者为台湾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sup>3</sup>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Lowell Lectur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c1925, p. 3.

<sup>4</sup> 原书英文译本见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dition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Revised and Abridg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参阅汪荣祖，《史传通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1997 年，第 198 页。

<sup>5</sup> 语见 John Bugnell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现，毅然放弃旧说<sup>1</sup>。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历史学者终知史学不可能，也无必要比拟自然科学。

回看来时路，当西潮初来时，国人痛科技之落后，犹以累积的文史之学自豪。然时至今日，科技日益发达，有迎头赶上之势；而文史与社会学科仍瞠乎其后。盖因科技普世，不因不同文化而异，故可追赶，甚至青出于蓝；文史之学有其文化之根，根断则如浮萍，漂泊无归，唯有俯从，何来并肩，遑论超越？

## 西学东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学东来，西学的资源最早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本。这批书除了宗教与史地外，绝大部分属于数理工程等自然科学书籍。康有为阅读这批书甚多，受到影响很大，遂将心智之学与物质之学混为一谈，误以为实证的科学之知，可以解答抽象的哲学问题，认为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运用到政治、伦理、玄学等领域，人文现象也都有公理法则可循。他惊羨科学思维的严密，相信数学乃最完备的知识，因而欲用几何公理来论断人类平等、人伦关系、礼仪刑罚、教事与治事<sup>2</sup>。因此康有为以科学原则为“实理公法”，应用到人事，诠释人文思想，导致“知识论上的偏见”与文化一元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公理”，历史只有世界史，各国历史的不同，乃发展阶段的不同。所以康有为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多认为文明乃人类公共之理，此一元论文化观点来自西方科学思维，对人类前途满怀乐观，展望世界大同之将至。

康有为下一代的学者渐能直接阅读西书，但对科学的崇拜有增无减。“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以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问题。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D. W. Kwok）教授，曾有专书论述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兴起，指出中国由于科技落后，对科学热情十分高涨，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都非科学家，但都相信科学万能，视为现代价值的全部，也因而反对宗教、民间信仰以及传统价值，最后形成“物质一元论”（materialistic monism）。郭教授认为科学主义经过“五四”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后更为严重，就是一意崇拜科学，影响虽大，但并无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更模糊了维柯所谓心智之学的本质，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具有普世价值<sup>3</sup>。自然科学的认知，不涉及个人因素的思考，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然而心智之学不可能是“普世的”，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会有不同，因其不同，故有“主体性”。换言之，不辨心智之学之异，不明主体性，便无话语权。

## 史学的西化

回顾百年以来，中国史学刻意追求西方现代史学，最初梁启超仰慕西方的“国史”（national history）而主张“国民的历史”来否定旧史为“帝王家谱”。此后国人套用西方一元论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以论带史，甚至曲解旧史。傅斯年留学英国于归国途中，即致书顾颉刚，以“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sup>4</sup>相勉。傅氏欲将历史地质学化、生物学化，即由此而来。傅氏归国后，极力推行史学之科学化，结果史学的科学化不成，将史学沦为史科学。然而在追随西风之下，传统史学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或是史学史里没有生命的遗迹。所以在三十余年内，“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变化”<sup>5</sup>。所谓“全方位的变化”者，就是向西方全方位

---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pp. 223, 210.

<sup>1</sup> 参阅 John B. Bury, *Selected Essays*. Freeport: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8, p. 70.

<sup>2</sup> 参阅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载蒋贵麟辑《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39-65页。

<sup>3</sup> 参阅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 29, 30, 69, 190, 193, 200.

<sup>4</sup> 《傅斯年选集》，第3册，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第408页。

<sup>5</sup>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倾斜，在西洋史学的影响之下，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而进入“现代”。

西洋史学继 16 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17 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动、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于 19 世纪的西欧开始“现代化”。史学在西方的现代化导致学院治史，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史学工作者得以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职业，奠定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制度。故现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备有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使历史研究人才与文献资料能够集中，而不再为政教服务，或不再沦为贵族的余兴。学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由专人负责，历史写作成为信实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教训式、空谈式或纯描绘的叙事。学院化与专业化之后，历史学被认为是严密而精致的学问，随着现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之要求，逐步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乃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sup>1</sup>。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三化”，自有其强大的吸引力。中国闻风响应可以理解，然不免与传统切割，有了断层。梁启超首先批判中华帝国史为“帝王家谱”，以演化论批判传统史观之停滞不前，自称要搞史学革命，亟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sup>2</sup>，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合理性”破坏甚大<sup>3</sup>。所以梁氏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变法维新”，而是一场史学革命。他严厉谴责传统史学，几乎将之全盘否定。持此论者除梁氏之外，大有人在，如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马叙伦也说：“中人而有志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汪荣宝则欲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为中国未来“新史学之先河”。曾鲲化更要“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代之以“进化的历史”。1904 年问世的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意在“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sup>4</sup>。然则梁文夏书所示者，明明是弃旧纳新，看不到从传统演变到现代的轨迹。

早在 20 世纪初，西洋学制开始在中国推广。民国元年政府明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已完全仿效西方学制，历史也成为西式的学科，传统史学被视为陈旧落伍而渐遭鄙弃。民国以后的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经学与史学分途，史学成为自立门户的学门，并在大学里建立专业的学门。北大首先建立“史学门”，无论在教学与研究上，与传统学风渐行渐远<sup>5</sup>。自此，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遂与得现代风气之先的西洋现代史学相随不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现代史学更日趋西化，唯西法是从。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易名为史学系，正式与西方历史教育制度接轨，开拓西洋史课程，并渐以讲授西洋史的方法来讲授中国史。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sup>6</sup>。何炳松于 1917 年自美留学归国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创办《史地学刊》，大力提倡美国的“新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则于“五四”之后创办《史地学报》，也成为宣传和译介西方现代史学的重镇。北京、南京之外，其他各地的新式学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的指标。

中国现代史学颇讲究考证方法，貌似呼应乾嘉朴学，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而取法欧美，尤重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史学方法论，著意于“不以今论古”，留德的姚从吾早年在北大、晚年在台大都强调“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之说，以档案文献来辨伪考证，重建历史真相，就是在响应兰克，并非承继实事求是的乾嘉考据学风，可见“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学者，鲜能以乾嘉训诂之学考史。中国现代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也是在响应兰克实证学派的方法论。伯伦汉（又译班汉姆，Ernst Bernheim, 1850-1942）所著《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1914）一书集兰克史学方法之大成，经其法译简本与日译本的转介，被

<sup>1</sup>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的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年，第 221 页。刘龙心受此启发写成专书，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 年。此书可证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史学教育之全面西化。

<sup>2</sup> 梁启超：《新史学》，《清议报》1902 年 2 月 8 日，《饮冰室文集》第 34 卷 25a-33b 页。

<sup>3</sup> 参阅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 年第 1 期，第 20-29 页。

<sup>4</sup> 参阅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80 页。

<sup>5</sup> 参阅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sup>6</sup> 转引自刘龙心：《学术与制度》，第 136 页。

奉为经典，认为西方的内外考证学要比乾嘉考证学与训诂学优胜<sup>1</sup>，对“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胡适更大倡西方科学方法，强调史料乃是考证真相的命脉。顾颉刚受到胡适的影响，从辨伪入手，以建设真实可靠的古史。他指出伪古史系统是由层层累积起来的神话与传说所造成，并打破中华民族出于一元的传统看法<sup>2</sup>。

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唯物史观也来自西方，对中国现代史学，尤其是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马克思主要根据西方历史经验提出全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说，每一个阶段的物质基础是“生产模式”，一方面是生产力，由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组成，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关系，由劳动力与社会组织形成。两者本身的不稳定与内部矛盾导致变动，生产潜力将会影响一切，使新起的阶级取得主导地位<sup>3</sup>。马克思学说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提出了科学性的一元规律，当被引进到中国时也被视为是科学的史学。近人不断将所谓马克思“史观派”与傅斯年“史料派”视作中国现代史学里对立的两个主要学派<sup>4</sup>。其实两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但都是在西学的影响下搞史学的科学化。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自有其精辟之处，然绝非自然科学之一。李大钊引进唯物史观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sup>5</sup>成为以马克思理论治史的开山之作。他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西周前之原始社会、西周奴隶社会、春秋时代之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之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设定的前四阶段，最后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然而各阶段未必能适合中国的历史经验，所以各阶段的分期一直难有定论，诚如一位大陆史学工作者沉痛指出：“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sup>6</sup>

西方现代史学主张无证不信，引发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风潮，对中国古史表示极端的不信任与断然否定，几欲全盘推翻古史，提倡西方人所谓的信史，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破坏颇大，直至晚近中国才“走出疑古时代”<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现代史家下视传统、追慕西方之际，也有不少西方现代主流史家鄙弃中国传统史学，认为根本没有重要性。例如英国著名史家艾尔顿 (G. R. Elton, 1921-1994) 断言，“历史意识”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乃西方所独有，在东方无论是印度或中国，都是“反历史的” (a-historical)<sup>8</sup>。美国史家陆卡士 (John Lukacs) 更信心满满地说：“历史意识确实是西方专属的，在西方之外对既往的记忆显示一种历史的不足。”他更引用哈斯 (William Haas) 之说，认为“西方文明才能产生与发展真正的历史”，又认为“其他能言善道民族如印度、中国、波斯、日本的可靠历史却都是西方人写的”<sup>9</sup>。英国史家普冷布 (J. H. Plumb, 1911-2001) 竟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讲道德多于述史”，因而认为中国史学中设有“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sup>10</sup>。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白乐日 (Étienne Balazs, 1905-1963) 居然也把传统中国史学错误地视为“官僚写历史给其他的官僚看”<sup>11</sup>。顺流而下，自有更极端的说法，如丹斯(E.

<sup>1</sup>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42-43、52-53、59页。

<sup>2</sup> 参阅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112页。

<sup>3</sup> 马克思史观的扼要综述可参阅 David Mc Lellan ed., *Marx: the First 100 Year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3, pp.57-102.

<sup>4</sup>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1979年第1期，第2页。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月刊》1941年第4期，第1-36页。

<sup>5</sup>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sup>6</sup>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另参阅 Helmut Fleischer, *Marx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sup>7</sup> 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sup>8</sup> 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Co., 1967, p.11.

<sup>9</sup> John Lukac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Remembered Past*.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p. 23.

<sup>10</sup>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69, pp. 22, 21-22.

<sup>11</sup> Étienne Balazs, “L’histoire comme guide de la pratique bureaucratique”, i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 of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vol. 3, p. 82.

H. Dance) 所谓“中国既不知历史为历史，也不知真实为真实的道理”<sup>1</sup>。我们所敬仰的西方现代史学，有如此多的主流史家既傲慢又带有偏见地藐视中国传统史学，我们若不发声，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史学的话语权。

## 中国历史话语权的外移

西方史家既多以其现代史学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史学，自亦以为彼所研究的中国史也优胜于中国学者，而中国学者也往往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凡西洋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之书，不论优劣都受重视，乐于翻译引进。洋人研究中国历史或有身不在庐山的优势，但若凭其文化的偏见、理论的执着以及双重标准而放言高论，难道也要盲从？例如名重一时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著书立说，论明代张岱，却不能卒读张氏文，谬误百出，而海峡两岸竞出译本，洛阳纸贵<sup>2</sup>。甚至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年轻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妄指湖南人不是中国人<sup>3</sup>，而此谬论也有人急于译成中文。更令人关注的是近年美国流行的所谓“新清史”，直指大清非中国，华语世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虚心向外人学习<sup>4</sup>。各地华裔学者觉其新颖而多有风从者，甚至认为是了不起的新发现，而忽略了大是大非，无不显示人文自主性或历史解释权之丧失。吾人须知所谓新清史，实欲以后现代解构理论，颠覆大清为中国朝代的旧清史，否认满族汉化，主张满人有其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彼所见，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而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清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其说并不很新，岂不就是战前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的翻版？未料“新清史学派”（The New Qing History School）的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居然自承是“跟随冈田英弘教授学习”，他“和其他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都很看重日本这方面的研究，我（欧氏）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了我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多大”。他更说：“这些事情我从不掩盖，相反我对此感到骄傲。”<sup>5</sup> 启发欧立德的冈田英弘，就是《从蒙古到大清》一书的作者，此书开宗明义就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都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大清帝国于1636年在长城之北的沈阳建国，1911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于1912年崩坏，而大清帝国的领土则继承自蒙古帝国的领土。”<sup>6</sup> 冈田不认为元、清是中国的朝代，所以中国不应承继元、清的疆域。他说忽必烈建立蒙古帝国一部分的元朝，明太祖包围大都，元顺帝败退蒙古，但他认为元朝并未亡国而是进入北元时代。大清建国之初便继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领土。简言之，大清所继承的是蒙古而非朱明。这就是冈田之书的核心论点，而新清史显然认同此一核心论点。

新清史论点的主要依据何在？这些学者首先必须质疑汉化说，因“汉化”涉及清帝国的本质。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拒绝汉化之说最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sup>7</sup>。哈佛中国史教授包弼德（Peter Bol）也认为“汉化”用词不妥，

<sup>1</sup> E. H. Dance, *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 London: Harnap, 1971, p. 87.

<sup>2</sup> 详阅汪荣祖，《梦忆里的梦呓：评 Jonathan D. Spence,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2009年9月，第139-149页；《上海书评》第65期，2009年11月，第8-9页。

<sup>3</sup> 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参阅拙撰书评，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49（2009），pp. 490-495.

<sup>4</sup> 详阅汪荣祖，《以公心评新清史》，载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中坜：中央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56页。

<sup>5</sup> 见欧立德访谈记录，载《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7日。

<sup>6</sup> 冈田英弘：《从蒙古到大清》，陈心慧、罗盛吉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sup>7</sup> Pamela K.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 p. 2. 笔者从未说柯女士“反华”，而是指出她强烈抨击“汉化”概念，班班可考。

建议以“文明化”来替代“汉化”<sup>1</sup>。然而所谓“文明化”之“文明”非即“汉文明”乎？然则，所谓“文明化”岂不就是“汉化”的代名词，又何必多此一举？大清盛世号称“中国风”（Sinic Pax），但欧立德欲以“满洲风”（Manzhou Way）代之，认为“汉化”淡化了征服王朝在历史上的角色，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然而族群界限却愈来愈严，所以要去除“汉化”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他批评汉化论者忽视了基于相同背景而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承担本族共同命运的族群意识与我族认同。此即欧立德所谓的“族性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论，认为其重要性超过儒教的正当性。他说满族靠“军事”（superiority of military）与“威吓”（climate of fear）以少数统治多数，意在划清满族征服者与汉族被征服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使之壁垒分明，以便说明权力完全掌控于满人之手，与中国无关<sup>2</sup>。在此欧氏明确认为中国人仅是汉人，他不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他会说：乾隆是“非中国人的中国统治者”（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sup>3</sup>。但是清帝不仅崇儒，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可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教化的朝代，而且清帝明白自称中国。甘德星曾用四份康熙遗诏，驳斥清帝不是中国皇帝的说法。他说遗诏是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显示满汉一体意识。从遗诏内容可知，康熙自称是中国皇帝，满文译本亦不作“汗”（xan），而作“皇帝”（xôwangdi），他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另从《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与《尼布楚条约》满文本，也可以印证俄国人也视大清为中国。更不必说康熙在遗诏中一再引用汉典，将“满清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之内”<sup>4</sup>。所以，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而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

欧立德有一大哉问：“如果满洲人如此认为是中国人，雍正皇帝何必要花时间发表《大义觉迷录》，来昭告每一个人？”<sup>5</sup>欧氏显然误读了雍正皇帝的意思，雍正的用意有二：一是极力驳斥他失德的谣言（取皇位不当，流言来自他的兄弟），因有德者即合法，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二是强调夷夏一家，论证满清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明言华夷之别犹如籍贯之不同。至于谁主天下，有德者即有其位，而“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雍正如此明白说要“为天下君”，就是要做合法的中国皇帝，如果不认同中国又从何说起呢？

欧立德强调八旗制度，说是“为维持满洲的族性认同，以及持续大清统治扮演了充满生命力的角色”<sup>6</sup>，以彰显满族国家的特性，并掩盖中华帝制的属性。其图谋势必会碰到史实的铁板，早在1936年孟森已发表有关八旗制度的长篇大论，文中一再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之八旗制度，以八旗平列，为其所定的国体，全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所以八旗可以说是像联邦制的“联旗制”，而各旗之属人除女真族之外，也包括蒙古族、汉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并不是欧立德所谓的“族群认同”，而是认同旗主，是一种君臣的封建关系。然而，当满清入关称帝后，这种封建国体无法适应大一

<sup>1</sup> Peter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no.2 (1987), pp. 461-538.

<sup>2</sup> Mark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7.

<sup>3</sup> Mark Ellio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Library of World Biography, New York: Longman, 2009, pp. xi, 51.

<sup>4</sup> 请阅甘德星：《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载汪荣祖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第109-114页。

<sup>5</sup> 欧立德2016年在北师大高端论坛与笔者对话时的发言稿的大哉问，原文是：“If the Manchus were so Chinese, the Yongzheng emperor had to go to such lengths to try to prove it to everyone by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book in the first place.”

<sup>6</sup>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9.

统的帝国。尚未入关的皇太极已感到八旗事涉理想，难于立国，乃苦心思变；入关以后，更欲抑制旗主的权力，并旗夺产更不能允许各旗属人“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顺治、康熙以来已经蜕化，到雍正朝制作《朋党论》，就是要清除“各旗主属的名分”，否则何以彰显皇权？雍正成立军机处之后，连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与职掌也显著减少，“逐渐空存其名，最终消亡”<sup>1</sup>。所以满清入关以后与明朝争中国之天下，八旗已非原有的祖制，亦非顺治初期诸王分占的八旗，不得不以汉族传统的大一统体制为国体，以儒教名分之说来压倒太祖八旗并立的祖训<sup>2</sup>。换言之，清帝为了君临天下，创字内一统的局面，势必要取用中华帝制，不得不破八旗原有的立国精神，因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与推选之制实在有碍皇帝之至尊。对清帝国而言，除仰慕中华文化之外，汉化更有实际的政治需要。欧立德视而不见，强以为直到 20 世纪八旗始终是“纯正的制度”（hallmark institution），更亟言八旗与满洲族性与认同的关系<sup>3</sup>，居然想要否定后现代极端理论都不敢拒绝的基本史实。事实上，无论满、汉，所认同者非其族群，乃大清皇帝及其所承袭的中华帝国，国号曰清，所以族群认同并不影响国家认同。大清向西扩张也是靠大一统帝国的实力，清帝国的根本在中原，国都在北京。

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自称“春秋者，天子之事”，推崇中华正统的《通鉴纲目》，并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全书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览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sup>4</sup>。乾隆毫不含糊将其本朝（清朝）视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sup>5</sup>。乾隆时代编撰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不仅将未入关的始祖努尔哈赤冠以中国皇帝的庙号，称之为清太祖，而且在实录中并不讳言他曾向大明称臣，以及努尔哈赤曾接受明朝龙虎将军封号的事实<sup>6</sup>。乾隆也曾重修辽金元史，并没有视之为征服朝代或外来政权。所谓重修，“在改正人、地、职官、氏族等音译，而不改动文字”<sup>7</sup>。最主要的，重修后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也就是说，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即乾隆所谓的“海寓同文”，满清一朝又何从自外于中国？

包括新清史在内的欧美学者，或以颠覆中国的“大写历史”为能事，却无意间囿于其文化语境的“当代论述”，不免陷入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然由于欧美在现代掌握学术的话语权，很容易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风潮冲击西方现代学理，虽撼动中心论，但仍有不少中外学者以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缺乏明辨是非与批评的能力。例如不明就里，不读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说，赞美其主张利用满文资料，殊不知清史专家早已用之；欣赏其中亚视角，殊不知其意在以边疆为中心，否认大清是中国的朝代；以汉化为老故事而不愿谈，殊不知正中其凸显所谓“族群主权”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论点，貌似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新清史话语或可呼应后世所谓“历史乃史家之创作”，但其“大清非中国”的创见经不起事据与理据的检验，亦可证明历史真相未必能由史家自由寒暑笔端也。

<sup>1</sup>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558页。

<sup>2</sup>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第218-219、262页。

<sup>3</sup> 语见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41.

<sup>4</sup> 乾隆御笔《通鉴辑览序》，清高宗敕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台北：新兴书局，1959年，第3页。

<sup>5</sup> 语见《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条。

<sup>6</sup> 参阅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13、217页。

<sup>7</sup> 何冠彪：《论清高宗之重修辽金元三史》，载《明清人物与著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5页。

## 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

下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西方现代史学已经遭到质疑，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出现“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挑战科学的历史，强调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相，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写他自己的历史，也只能有相对的真相。史学的科学化既已失败，唯有少数历史哲学家仍然在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的科学法则之外，西方史学家转而取社会科学为史学之辅助，用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治史<sup>1</sup>。因而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都是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着墨较多，也无非是随西方之风尚而转移。

中国现代史学倾心学习西方现代史学，无论科学化史学或社会科学化史学，都视历史客观求真为当然，未曾放弃实证致知的方法，也没有停止追求历史的真相。然而同样来自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忽然彻底质疑求真之可能性。后现代理论繁多，几无不质疑现代西方视为万能的理性与科学，甚至怀疑科学的认知，犹如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 1908-2009）所说，现代的科学 with 理性并不比野蛮时代的神话对人生更为有利。就史学而言，后现代主义理论否认重现客观过去之可能，认为历史仅仅是史家主观的作品，与文学作品并无二致，彻底否定了现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使西方现代史学求真美梦破灭，譬如以为鸿鹄将至，忽然发现并无鸿鹄之为物，顿然失据，冲击之大犹如梦魇。而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随西风起舞，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如浮萍之无根，更加失据。

后现代理论未尽可取，但无疑动摇了西方现代史学的霸权，尤其凸显其强烈的“自主性”。对我们而言，理当有启发史学自主性的必要。现代中国一直有人在写中国史学史，但主要在整理“国故”，排比史料，列数个别史家，没能将之成为当代史学活生生的资源。中国传统史学若果如有些西方史家所谓只有史料而无史学，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史学思想，自不足深论，但斯乃西方史家之偏见与误解<sup>2</sup>。

中国传统史学有几千年的历史，为特殊中华文化之产物，就像现代的西方史学，乃是西方历史与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历史与文化有其特殊性格，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普及性，其内涵与结论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既然是文化之产物，而中西文化有异，与西方史学原应多元并立，相互理解观摩，不必从风，大可参照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文化多元论之义谛，反思传统，发其底蕴，求其更新，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而后可望补西方史学之不足。中国现代史学只有批判地重新整理传统史学的遗产，才能丰盛富足。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确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可与西方史学呼应、对照以及比较的具体议题甚多。中国传统史学里比较贫乏甚至欠缺的是历史哲学，但历史哲学在西方虽为一亮点，然较晚出，发端于 17 世纪的维柯，到 18 世纪后期德国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历史哲学之著作问世<sup>3</sup>，始被认可。19 世纪唯心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尤闻名于世，但历史哲学大都由哲学家建构，并非主流史家的要务。

西方各国史学的自主性昭然若揭，英、法、德、俄诸国之国史的话语权皆掌握己手，不随他国起舞。西方列强凭其现代霸权，更进而欲主导所谓落后地区之学术话语权，见解与议论纵横，大有越俎代庖之势。然而中国现代史学却不是由传统转化而来，而是倾心接受西方现代史学，不自觉放弃了自主性，亦因而往往将国史的解释权拱手让人。两岸三地的中国史学界，正可于后现

<sup>1</sup> 如法国“安娜学派”（Annales, 俗称年鉴学派）就以社会科学治史闻名，其名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社会科学为史学之善邻，取“守望相助”之意。参阅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Sarah Mathews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up>2</sup> 详阅汪荣祖：《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第 135-162 页。

<sup>3</sup> 赫尔德奠定历史哲学之两书为 *Idea for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Mankind* (1784) 以及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37)。

代风潮抨击西方现代史学之余，在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之际，临流反躬自省，检讨随西洋现代之波而逐流的遗憾，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使中国旧史学创新？如果不徒托空言，则须知如何实践。如要老干发新枝，需要提炼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以检验家藏之贫富，何者彼可补我之不足，何者我可补彼之不足，以冀能有扎实而自主的史学，话语权便可操之在我。

中西各有其悠久的历史，史学传统也都绵延数千年不绝；所不同者，乃各有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与不尽相同的史学传统。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而一致，数千年来用同一种文字书写，几以同一方法书写，而彼西方则多有断续而又颇为分歧，书写之不同文字不下五十种，然就“史学逻辑”（the logic of history）而言，史学之天下似无新鲜事。史学内涵约有三大范畴，即史学方法、史学史、历史哲学。中西文化有异，史学思维与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既称史学，其要素不可能或缺。所以若动辄说，“我有彼无”或“彼有我无”，往往似是而实非。中西史学固然各有特色，但所谓特色绝非一方所独占特有，而是双方各具，时而呈现在方法上、风格上以及思想上有差异性。即使彼我皆备，深浅仍不一，则可以深补浅；若详略有异，则可以详补略；若彼我虽同，表达不一，正可互通以增益其事。岂不善哉！

## 【论 文】

### 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sup>1</sup>

——敬答姚大力先生

汪荣祖

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长住后，在华语世界里努力提倡写书评的风气，并自愿担任某学术期刊的书评编辑多年，更喜读《上海书评》，每周日一见，办得有声有色，为之鼓舞不已。书评之所以值得提倡，不仅因发达国家的期刊登载大量的书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书出之后有人读、有人评，才有意义，学术才会因商榷而后有进步。

书评的写作有其基本规范，要评论一本书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书的内容，评论书中内容要针对议题，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不作说明，才能对作者与读者有所交代。然而姚大力先生评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既不介绍全书的内容，又不认真对待书中提出可资商榷的议题，仅偶尔一提作者及其论点，他的基本心态是认为我们的“商榷”是无端的“攻击”，应该虚心向“新清史”学习，完全不理睬我们针对“新清史”所回避的问题，以及扭曲基本事实的缺失。他说“收入本书的八篇论文里，只有一篇对‘新清史’有比较具体的正面肯定，还遭到主編者在‘导论’中的长篇批评”。这话是针对我而来，却不敢明言，如何肯定、如何批评、批评是否有理，皆一概不论，这不是论学的态度。总的来说，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打个比方，律师要替被告辩护，总要了解被告的种种，才有可能打赢官司。要为“新清史”代言，至少要读懂“新清史”作者群的原书。

<sup>1</sup> 《东方早报》2015年5月17日。[http://www.cssn.cn/zgs/zgs\\_gd/201505/t20150518\\_1938670\\_4.shtml](http://www.cssn.cn/zgs/zgs_gd/201505/t20150518_1938670_4.shtml)

姚先生认为汉化是“旧故事”，不值得再说，这可不是“新清史”作者们的认知。他们面对“汉化”如临大敌，因为不仅中国学者有此说，而且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持此说。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必须要批判的“大议题”，要纠正的“错误故事”。例不细举，便知他们是不认同“汉化”的用词与概念的。请看欧立德（Mark Elliot）说：“尽管满洲的同质化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象征，必须说：用‘汉化’一词来描述此一过程，是相当错误的。”（Despite the many and varied signs of Manchu acculturatio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using the word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is rather misleading.）（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p. 28）克劳丝蕾（Pamela K. Crossley）女士拒绝汉化之说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见她所作“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文，载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 p. 2]。她又说：“继续不断地用此词（汉化）模糊了清朝许多政治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势必会有将中国认同束缚于二十世纪早期极其夸大矫饰的民族主义之虞”（The persisting use the term has obscured man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ore important, threatened to shackle Chinese identity to the rigid conceits of nationalist rhetor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223-24）。克劳丝蕾汉名柯娇燕，我认识她，知道她早已放弃这个汉名，很不愿意再听到它；她连汉名都不要了，可略见她厌恶汉化之甚。姚先生认为她不是“坚定的反汉化论者”，既不知其人，也未读懂其书。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更引用柯娇燕之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是清朝终结之后，于1912年在讨论国家定位时才出现的（见罗书第2页）。足见这几位“新清史”健将是不认同“汉化”这个名词与概念的，大有去之而后快的意思。姚先生认为“汉化”是被新清史所接受的结论，是严重的误读与曲解。

姚先生认为“罗友枝发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象清代：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标志着‘新清史’在学术界现身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无知乱道。其实，罗文引用了许多新清史的观点，有很长的书目。罗女士发难抨击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在著名的《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却粗心地将此文误作何先生于1975年当选为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辞，更不当地从何先生所论清代的五项重要性中仅抽取“汉化”一项而加以抨击。何先生论文所举的五项重要性，“汉化”仅是其中的第三项。列为第一项的就是满族统治者在二百年间开创了“一个最庞大稳固而行之有效的多民族帝国”（the largest consolidated and administratively viable multiethnic empire），认为是绵长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a unique contribution）（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 123）。罗女士单挑“汉化”，足见她并不如姚先生所认为的，汉化是可以接受的老故事，而是急切需要针对的重要故事。否则，何先生何须以“维护汉化”来回驳？

遗憾的是，姚先生未细读两位的原文，贸然为罗友枝女士撑腰，矛头指向何炳棣先生，认为何先生是一极端的汉化论者。姚先生甚至认为他比何先生更能读懂罗女士的原文，未免过于自信，甚至扭曲事实说，罗女士“对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确的批评”，若真正读了何先生的文章，能说“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吗？在此不妨略说我所知的内情，何先生有力的驳文，被期刊编者当作正式的论文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Feb., 1998, pp. 123-55），不料罗女士虽经编者一再催促，终未能回答。罗女士挑起笔战，却又拒绝应战，在有理必须说清楚的西方学界，实不多见。何先生曾对我笑称：“大水岂能冲倒龙王庙！”没想到，十余年后，他的祖国居然有人认为“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若他尚健在，必会大发雷霆。按大清帝国的疆域涵盖内亚，没有错，“清王朝代表了内亚和东亚相统一的最高阶段”，或“清的统治模式是内亚和东亚的统一”，也没有错。既没有人“只见内亚、不见东亚”，也没有人“只见东

亚，不见内亚”，问题是中心在东亚还是内亚？姚先生似乎是认同“新清史”所说，元和清是两个内亚边疆帝国，那帝国的中心在内亚了？所以他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说是“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又说清帝“心目中，汉、唐、宋、明是一种一统，元、清又是另一种一统”。这是附和“新清史”的主张，满清帝国是属于满族的内亚帝国，有异于中华帝国，所代表的是“大满洲风”（pax Manjurica）而非“大中国风”（pax Sinica）。中国历史上居然有“两国论”，符合历史事实吗？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内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内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雍正皇帝正式批驳华、夷之分，中外之别，“尊崇孔子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姚先生居然把雍正帝所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说成清仅继元之一统。雍正明明是说合两者的大一统为一。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视清朝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清代重修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乾隆所谓“海寓同文”，何来不一样的大一统？包含汉族以及许多其他族群的“大中国”，正是包含何炳棣在内的我们，视为当然之事，“新清史”能接受吗？显然不能。他们明言要以“大满洲”取代“大中国”，他们眼里只有“大满洲”内的“小中国”。

“新清史”的“内亚视角”固然有其价值，有助于认识多元中国，但不能说有了内亚，中原就成为内亚的附属，边缘成为中央，中央反成为边缘，说得通吗？元、清两代的蒙古族、满族皇帝入主中原，都想当中国的皇帝，建都于北京，显然主要立足于中原视角，而非内亚视角。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充到全球，虽号称日不落国，但仍然是大英帝国，号令发自伦敦，中心仍然是英伦三岛而非印度或澳洲，并未因“世界视角”而改变了大英帝国的本质。美国立国时不过十三州，不断西进后才抵达太平洋海岸，比最初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二，后来又并吞了夏威夷与菲律宾，但首都一直在东岸的华盛顿，并未因西进而改变美国的本质。那么，为何中国的西进必须改变中国的本质呢？清朝建都北京，上承明朝，下开民国，中心在东而不在西，无可置疑，无论政、教、经、社、文等重大方面，都难以抹去汉化的烙印。清帝不仅以中国自称，而且每年长时间居住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没有汉化，何以今日满族及其文化几乎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汉化一如西化，并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存亡。

姚先生说“抵制全盘汉化当然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汉化的全盘否定”，但何、罗辩论“汉化”所用的英文字都是“Sinicization”，从未有过“全盘汉化”（wholesale Sinicization）的提法。姚先生要为“新清史”辩护，加上一个“全盘”来曲解“汉化”，可谓用心良苦。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事实上，如何炳棣所说，汉化乃是一漫长过程，可追溯到史前；在这一过程中，多数所谓汉人也难免不染胡风，甚至有胡人的血统。换言之，在理论上，即使是汉人也不能说是“全盘汉化”。何炳棣当然也不是什么“全盘汉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很清楚地肯定满族皇帝开拓疆域，建立了包括内亚在内的大帝国，以及增加人口与财富的伟大贡献。姚先生没懂得“何炳棣的做法”，就妄加指责，太不公平了。姚先生以“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责备别人，而硬将“汉化”拗成“全盘汉化”，是哪门子的学术态度？

说到中国西进，可一提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主要探讨大清帝国之征讨蒙古、新疆与西藏，以及与沙俄在绵长边境上的对峙与交涉。他批评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视为当然，将内亚各民族统一于多民族的现代中国视为当然。他理解现代中国建立于被否定的过去并不特殊，也不愿以善恶来定帝国的是非，并联想十九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但他并未指出，现代美国疆域之

建立也是以征服与残杀为手段，而此运动也具有以“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许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今日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这种发展趋势不是濮培德所说“必然的”，不很“自然的”，那么，将中国分为五块、美国分为三块才是正常的历史发展吗？

濮培德将清帝国、准噶尔（Zungharia）蒙古与俄罗斯帝国并列为中亚草原三要角，并不恰当，因三者本质有异，不可一概而论。姚先生将清代中国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视为类似的旧式帝国，是不知“貌同心异”也。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与康熙大帝（1661-1723）约略同时，俄帝已全心全力西化，并亲往西欧学习，俄国在其统治下，引进大量先进科技，补助新兴工业以及执行“重商主义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整个十七世纪，愈来愈多来自西欧、中欧的商人、工匠、冒险家涌入俄国，追求商机与财富。不仅如此，连西欧的社会风俗也已进入俄国的上层社会。彼得大帝在其任内已使俄国成为欧洲强权之一。即使在彼得之前，俄国向东扩张也出于商机，俄皇伊凡四世（Ivan IV）以兵力支持巨贾 Stroganov 家族跨越乌拉山而东，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西伯利亚广大的土地。俄国“殖民”西伯利亚的最主要目的仍是资源，特别是皮毛、贵重金属以及容易取得的贸易品。将清帝国与俄帝国模拟，似是而实非也。姚先生认为俄国“具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相当“冒失”的，因为到十九世纪，俄国与其他欧洲强权已从资本主义发展到所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时期了。

从帝国的安全而言，沙俄之重心远在欧洲，蒙古早已不构成威胁。然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退回草原后，仍然是明朝北疆的威胁，还需要修边墙来防御，至十五世纪蒙古领袖也先崛起，曾于土木堡大败明师，并俘虏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北疆的蒙古威胁可说是与明朝相始终。清朝稳固了北疆，与漠西蒙古于太宗崇德二年（1637）建立朝贡关系，不再需要长城作为防御设施；毋需再修筑边墙，但长期征讨准噶尔也确有其安全的考虑。

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出了强横的雄主噶尔丹（Galdan）统合准噶尔成为内亚的一大政治实体。清廷平定准噶尔过程颇长，但却不能如濮培德般以近代殖民帝国的眼光来看康雍乾三帝之扩张。濮书颇多扭曲，如谓康熙亲征噶尔丹出师无名，噶尔丹也就成了康熙“扩张主义”的“牺牲品”。濮培德既知满蒙关系密切（见濮书页 122、124、127），却无视噶尔丹破坏满蒙历史关系之严重。康熙有言：“朕因是深知，此人（按即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语见《平定朔漠方略御制记略》）

我们应该理解康熙刻意在北疆建立的安全秩序，而此一安全秩序则是建立在所谓“旗盟制度”之上。旗盟是一种各自管辖、不相统属的制度，各旗之上虽有正副盟长，然盟长并不能干预各旗之内政，不过代表清廷监督而已，其目的显然欲以自治来收安辑之效。所谓会盟，乃定期之集会，以便联络感情，解决问题，亦即康熙的柔远之道，以蒙古为屏藩，防备朔方，而其安全布局之积极性与有效性远胜于明代的边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长治久安的政策原本要与蒙古各族和平相处，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贡贸易来满足蒙古族的物资需求，以资羁縻，与喀尔喀（Khalkhas）渊源尤深。喀尔喀有七旗三汗，于满清入关前即已臣属，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康熙元年（1662）派遣理藩院尚书至库伦会盟，宣达康熙谕旨，调解内部矛盾，诸汗一致遵从，大清帝国无疑是漠北蒙古的宗主国。

然而康熙的布局却为噶尔丹所破坏，噶尔丹不断向东掠夺侵吞，更介入西藏神权，又与俄国结盟，来鲸吞领地极为辽阔的喀尔喀蒙古，甚至还要煽动内蒙古。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甚而乘虚入侵内蒙古，劫掠杀戮，并造成大批难民。清廷闻报遣军与喀尔喀兵与战不利，更增其气焰，乃乘胜南下，距北京城仅七百里，京师戒严。连京师重地都受到威胁，康熙实不得不于1690年7月27日宣布御驾亲征。不过，噶尔丹虽于乌兰布通（Ulan Butong）之役受创，得以逃脱，但此役绝对是决定性的，噶尔丹此后一蹶不振，康熙更乘亲征之便，亲自与喀尔喀诸部会盟于内蒙古的多伦诺尔（Dolon Nor），重建安全秩序。但噶尔丹败遁乞和之后不到两年，又杀害清廷使臣马迪，要求喀尔喀七旗脱离大清，再度向康熙的布局挑战。康熙遂不得不再度用兵，但展示军

威之余，仍以招抚为主，所谓“宣化地方行围”。由于噶尔丹未如期来降，康熙于1692年2月三度亲征宁夏，率师出塞，昭莫多（Jao Modo）一役后，大批噶尔丹部众归服，青海诸部俱降。噶尔丹陷入困境，不久死亡。

康熙亲征剿噶尔丹历时七年，代价固高，但使漠北喀尔喀蒙古更顺服感恩，使喀尔喀蒙古得还故土，遂按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扩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统合。康熙晚年进军拉萨，收服西藏，也是以维护边疆固有的秩序，出发点是相当被动的。当准噶尔部于1718年之秋，入藏骚扰掠夺，并攻击驻拉萨的七千清兵，击毙清将鄂伦泰，康熙才命皇子胤禔率师入藏。康雍乾三朝的边疆政策有其一贯性，最后才能于乾隆朝彻底击溃准噶尔，使沙漠南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得享长期的安宁。这种政策与布局显然与濮培德所谓的近代殖民主义，以夺取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开拓市场为目的，大不相同。所以殖民的性质必须厘清，不可回避。姚先生不知“出于纯粹防御动机的扩张，是否就是一种应当予以肯定的扩张，或者是否至少比出于经济动机的扩张拥有更多的正当性”？据我所知，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说当然，至今美国仍凭其军事优势，为了其国家安全，在全世界扩张，不是吗？既然姚先生也承认，“在清朝立场上看，准噶尔确实对它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人应当理解，但濮培德并不理解，这就是不时出现的所谓双重标准，不知姚先生是否懂得？

清帝国经营新疆，终于建省，应是新疆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过程，但濮培德不认为中国拥有新疆乃历史之必然。我们要说的是，任何历史结果或非必然，但结果不可能改变，濮氏曾提到美国之西进运动，加州或德州终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之一部分，虽未必是历史之必然，亦不能改变“自然地”成为美国一州的历史结果。姚先生以责备的语气，说中国的读者往往有思想上的障碍，即“错误地推导出如下的论断，即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地存在着一个与今日中国版图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绝不能变小的中国”。我不知道任何有水平的读者会有这样幼稚的推论，如他影射拙编作者，那便是姚先生自己的思想障碍了。更有障碍的是，姚先生以现代的国家观念，视清与准噶尔为互不归属的国家。清朝要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勉强接受近代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各政权是争夺天下，不是近代概念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否则三国争雄岂不也成国际战争了？辽宋之间也是国际战争？姚先生如以为然，不妨改写中国历史。不过，无论古今中外，统一几乎必须通过“兼并”来实现的，但姚先生似乎也有疑惑。

“中国”这个名词没有姚先生说得那么复杂，中国从来不是国号，而是泛称或简称，早出现于先秦，随着疆域的扩大，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有一说，中国（China）即由Ch'in转音而来，秦汉以降各朝代莫不以中国自居。大清自称中国，则中国当然包括内亚在内的疆域。姚先生也知道“中国不等于汉”，但很多外国人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年，深知美国人嘴上说的“Chinese”指的就是汉人，因为他们认为“满族”（Manchus）、“蒙古族”（Mongols）、“藏族”（Tibetans）、“维族”（Uygurs）不是“Chinese”。有一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白人朋友从新疆访问回来，他对我说：“那里的人长得不像你”，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不是中国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一女性黑人姓Rice，我回答说：“你们的国务卿长得跟你也不一样。”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道或不肯承认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新清史”更提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说，认为各民族有自己的认同，故有自己的主权，清国是满人所建，所以不等于汉人的中国。记得“族群主权”的首倡者欧立德应《上海书评》访谈时，曾说虽虽爱好汉文化，但他的国家认同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的潜台词就是强调“族群主权”，满人爱好汉文化，仍认同他们自己的族群。欧立德不想想清帝国内的汉族与满族是认同两个国家吗？他自己即使接受中国文化，完全不影响他的国家认同是美国，乃两码事，可说引喻失义。他也没有引用他的“族群主权”来主张美国的黑人或印第安人独立建国。“新清史”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有详细论述，请姚先生认真参阅。

姚先生赞赏他的老友甘德星在拙编中的文章《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认为“言简意赅”。甘文以康熙皇帝为例，充分驳斥满清皇帝不是中国皇帝之说。他用四份康熙遗诏，指出遗诏的重要性，乃国家权力转移的关键文书，显示满汉一体意识。康熙自称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他所统治的都是“中国之人”。甘教授确定清帝的重心在中原而不在内亚。清帝设立理藩院处理边疆事务，从满文、蒙文、藏文对译中发现都有“外”意，认为无疑视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更重要的是，康熙在遗诏中，自称继承明朝的中国正统，并以自黄帝以来三百一帝中，在位之久为荣。甘教授证明，满清在康熙时，汉化已深，“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结论是“新清史”所谓大清非中国之说，完全不能成立：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并非以中亚为轴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顺治与之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复如此。姚先生既然认同甘文的论点，认为“意赅”，总不能如他所说“评论中的学术取向越强，批评就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老友“心有余而力不足”吗？姚先生既承认康熙是中国的皇帝，“新清史”却不这么认为，岂能脚踏两条船？姚先生的结论是“清朝和元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不就是拙编所要指出的新清史一大错误吗？然则，姚先生为何认为我们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批评新清史呢？更不可理解的是，姚先生悍然指责我们“满眼只看见别人的‘谬误’，把‘回应’变成一场声势凶猛的讨伐式‘反驳’，对这种态度可能需要有所检讨”，姚先生此类主观情绪性发泄毫无根据、不符事实，殊不宜见诸论学文字，这才是应该深切检讨的态度。

姚先生承认清朝不等于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又要曲说吕思勉先生不认为元朝是“中华帝国之延续”。吕先生把元朝写在《白话本国史》里，他的本国应该是中国吧，他写的应该是中华帝国史吧，他写的帝国史有中断吗？姚先生还要提“厓山之后无中国”的无聊之论，可见他虽同意他老友之说，仍心有未甘。其实，元、清不是“中华帝国之延续”，并非新见。日本的冈田英弘早就挑战中华帝国元-明-清的序列，而认为是“元-北元与明的分裂-清”，清帝国自元取得正统性，再南下统一蒙元原来的领土，所以清帝国是蒙古国的继承者。按此逻辑，清只能继承元，中华民国就只能继承汉人权政明朝了，也只能继承明代的疆域了。这算“过度的猜疑”吗？姚先生完全无感吗？

“新清史”诸君都是学者，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政治意图，美国学者对政治的影响也极为有限。但无可讳言的则是，这些所谓理论足以为具有政治目的者张目，质疑中国统治非汉人地区的政治正当性。这就是国内所谓“敏感”之所在。学术最好能避免政治，但往往难以避免。不料，姚先生却祭出“政治正确”的帽子，说什么评述新清史“往往隐含着对‘政治不正确’的高度，甚至过度猜疑”。姚先生似乎搞不清楚到底是政治不正确，还是史实不正确。新清史作者猜疑其批评者为“民族沙文主义”，并非实事求是讨论问题，逾越了学术讨论的分际。欧立德在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一书中傲慢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限制了大部分学者去尝试不同于刻板马克思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Chauvinist）的满洲史论述。”姚先生似乎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但在我们看来乃不实之言！老实说，我们在台湾出这本书，未必“政治正确”，如姚先生指国内学者批评“新清史”，是因为“政治不正确”，须知姚先生的代言在彼邦绝对“政治正确”（此词原是美国很通行的话）。我不认为姚先生言不由衷，而是没真正懂得“新清史”的性质，也没有好好阅读拙编，凭一点不正确的印象就大发高论。

事实上，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其核心议题并不很“新”，早在1920年代日本即有“满蒙非中国”之论，很能配合日本当年的国家目标。十年之后就有“满洲国”的成立；若非抗战胜利，东北、内蒙古、台湾岂能为中国所有？当欧立德提出“族群主权”的同时，所谓“疆独”、“藏独”、“台独”，都已是当前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能说“过度猜疑”吗？不过，中国应不应该这么大，当然不取决于理论，而有赖于国家的实力，姚先生提到的“政治焦虑感”，

以及嘴巴上的政治正不正确，根本无关宏旨。有趣的是，姚先生完全看不到“敌对势力试图分裂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狼子野心”，还要责怪别人“脆弱多疑”。百余年来至今，不少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图”，难道姚先生真的一无所知吗？当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大家都知道针对中国，唯独姚先生认为是“牧童遥指杏花村”。

姚先生在书评里忽然评起钟焄的文章，虽与拙编无关，但他说钟文不够全面，我觉得姚先生不仅对新清史的认识不够全面，对何炳棣的认识更不够全面。他说“新清史”对利用满文确有倡导之功，利用满文史料是新清史倡导的吗？非也！早有学者利用满文史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大学历史系就有广禄教读满文，也培养了一批能用满文治清史的学者如陈捷先、黄培、庄吉发、甘德星等人。我不知大陆的情况，必定也有。据精通满文的朋友告知，新清史诸君的满文程度相当有限，远不如他们有限的汉文程度。满文史料当然重要，我们更期盼能就满文史料写出重大的翻案文章，可惜至今尚未出现。史料绝不嫌多，充分利用满文、蒙文、藏文等史料，求之不得，但有人认为汉文史料只能揭示汉人眼中的清帝国，这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清代大量汉文文献看不到满人的观点？很多清政府的政令都是由汉文发布的，不是吗？

姚先生以“从事学术批评时，针砭尺度宜缩不宜增，丝毫不可效尤过去政治大批判中盛行的那种肆意拔高、无限上纲的作风”来评论拙编，将学术讨论与政治批判混为一谈，对我们来说，不仅荒谬，而且有点可笑。姚先生不知在国外学术论辩，往往是不留情面的，是有增无缩的。姚先生既然认为“新清史研究中当然还有很多值得再讨论的问题或者错误”，却以为我们提出讨论与指出错误是不应该的，也不认真讨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所指出的错误，而以教训式的口吻，要我们的“心态调整得更理性一些”。没想到姚先生居然如此高傲，真有点匪夷所思。

最后姚先生提到韩儒林教授。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学与他有一夕之谈，得知他于战后曾赴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因怕白色恐怖又回到大陆，并谈及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他是一位谦谦君子，有名的元史专家，绝不会认为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姚先生所引韩教授的话，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谁会说不是？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只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谁又会说不是？事实上，近百余年，日本及欧美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者，不知凡几。二战后，美国研究中国更进入学院化，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重视，作品可称汗牛充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老是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连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如人。现在姚先生对我们批评新清史很不以为然，并一再重复政治正不正确，我们应讲究的是史实正不正确。写书评要先读懂内文，要注意批评得正不正确、公不公平，愿与姚先生共勉。

2015年4月27日写于台湾新北市大未来居

## 【论 文】

### 汪荣祖再答姚大力：学术批评不是“打棒子”<sup>1</sup>

汪荣祖

【《东方早报》编者按】姚大力之前发文评价汪荣祖所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一书，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汪荣祖随后针对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发表《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一文回复姚大力的批评，姚大力很快以《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一文予以回应。二人关于“新清史”的争论还在继续，以下为汪荣祖针对姚文《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的最新回应。

<sup>1</sup> 《东方早报》2015年6月21日。

[摘要] 这些无限上纲的政治语言令我感到十分陌生与错愕，谁会把学术当政治斗争呢？姚大力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新清史，把批评他们当作“棒子打到新清史头上去”，学术批评可以等同“打棒子”吗？

我回复姚大力批评我所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很快有了回应。姚文的题目是《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载 2015 年 5 月 31 日《上海书评》）。然而内容并不是谈如何略芜取精，如何为我所用，而是针对我对他的质疑，并时而爆出情绪性的激愤之词。在网上还有他的学生为之叫好，说他的姚老师“抽”了我！姚大力更将我的文字随心制造矛盾，夸大其词，甚至曲解之余，代我认错，取得争胜的满足感。是谁在“深文周纳、巧言罗织”啊！众目可见，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说“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职，却说是兼差。就此而言，无论他的正题或副题，都有点文不对题。

我与姚大力素昧平生，全无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对事我针锋相对，不稍假借，然对其人仍尊之为“姚先生”，并“敬答”对我所编之书的批评，这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但是他毫不客气，不仅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轻蔑。类此针对个人的态度，我并不在乎，也不怪他，诚如他所说“入墨者黑”，我也只好随俗了。

### 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问题是清帝国的性质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本是假议题，没有人“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说“全面”，岂非夸大其词？我所编之书就是如他所说，很具体地指出新清史立论中“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何来全面否定？老姚优为者，不过是把别人的说法推向极端，然后加以抨击。一言以蔽之，我们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问题，是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既然说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讳才是正道，何况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芜杂”能忽略吗？我的理解是“芜杂”必须充分揭露后，证明是“芜杂”，才能略之。否则容忍“芜杂”，“菁英”安彰？更未免乡愿。

我说姚大力“未读懂”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是很具体的，但他夸大成“不识字”，有何意义呢？就像他夸张地说，“全面否定”、“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一堆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正面意义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编荒诞的形容词，除了他之外，谁说过这些话呢？我已具体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汉化”说，认为是一错误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们的原文来作说明，但姚大力仍然视若无睹。很显然，“汉化”与新清史所主张的“族群主权”有矛盾，所以他们并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汉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认为欧立德将“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其用意由于“汉化”难以否定，故将之极端化来否定汉化，因“全盘汉化”就像“全盘西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汉人，也难说“全盘汉化”。所以如果把“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则无“汉化”矣！但姚大力却将之误读为欧立德只不同意“全盘汉化”，还要自问他为何不可用“全盘汉化”？他当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将汉化解作“全盘汉化”，以便否认汉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劝姚不要再硬拗“全盘汉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盘汉化论”者，有这样蛮干的吗？

姚大力说我单挑“汉化”，就是他不读何炳棣原文的乱点鸳鸯谱，何文不仅指责而且抗议罗友枝单挑汉化。罗既然单挑汉化，何老先生当然以“捍卫汉化”回应，如果罗不抨击汉化，何又何须“捍卫汉化”？无“的”哪有“矢”啊！可是姚大力仍然要批评何文只谈第三条的汉化。姚大力似乎还是搞不清楚，新清史不是要对“汉化”作正面的反思，而是根本质疑“汉化”此一概

念与用法，甚至指责“汉化”乃现代中国民族沙文主义的产品，但姚大力仍然认为，新清史的“汉化观”没有什么不对。关于新清史的“汉化观”，我在前文已经详述，就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大清帝国既然拥有内亚，具有内亚属性，自不待言，谁会去否定内亚属性？但姚大力却“又惊又喜”地发现我承认了新清史的“内亚视角”。请问我个人以及所编的整本书，何来否认“内亚视角”的言词？关键是否如新清史所说，清帝国拥有辽阔的内亚之后，就成为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甚至中国竟是内亚帝国的一部分？姚大力对此最关键的问题，却推说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表态！（事实上，他浪费了不少笔墨大谈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他难道看不见，新清史夸大内亚属性之后，认为清帝国融合两种传统之后，是一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是新清史的论断啊！姚大力却对我大兴问罪之师。他引用我的结论，不提我的论证，大骂“错乱”。正因为此乃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商榷”，以回应新清史，主要反驳清帝国是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之说，未料却触老姚之怒。

欧立德厚达五百八十页的大书《满洲风》（*The Manchu Way*，编者注：又译为“满洲之道”）以八旗与族群认同为主题，包含甚广，绝非如姚文所说“继续维持满汉界别”。他是要以“满洲风”来取代“中华风”（*The Sinic Pax*）的。然而“满洲风”能取代“中华风”吗？显然不能！就拿八旗来说，乃满洲最根本的制度，请问满族入关之后，清帝推行的是传统中华一人帝制，还是八王共同议政制？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姚大力认为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却不说哪些政治文化资源，也不说“至关重要”到何地步？是否如新清史所说，重要到已不能再称作中华帝国了？姚大力说，有理由把清与汉、唐、宋、明的“统治体制区别开来”。汉、唐、宋、明都是中华帝国，区别开来清帝国即非中华帝国了？那岂不就是清不是继明，而是继元。言下之意，岂非与中华民国只能继明的说法相当一致。这种主张姚大力能接受吗？没想到他居然说，在汪荣祖的心目里，“满洲传统根本就不属于中华传统”！他老兄代言错了，须知这话是在新清史诸君的心目里，不是在我的心目里。他对“代言”一词，似甚敏感；其实我毫无贬损之意。你觉得产品好，为之代言，应该是光荣的事啊！但“代言”绝不可不诚实。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满族入主中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国号曰清，建都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毫无疑问在中原。清朝治理内亚的方式与中原不一样，因地设施，无足为奇，因仍在中原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更何况地处内亚的新疆后来也成为中国的行省。何炳棣说清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非内亚，并没有认为汉化是清帝国成功的唯一原因，他一共举了五个原因，但他认为清帝国统治政策的核心仍然依赖传统中国的政策。这话并没有错，但姚大力偏偏要将何先生定型为一“尺有所短”的“极端汉化主义者”！中原汉人与汉文化对大清帝国的贡献，何先生已经讲了许多，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

众所周知，清帝国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多民族政权，中华帝国从秦到清，一直是多民族互动的天下。所以甘德星证明康熙自称中国皇帝，至关重要，然而姚大力却说不重要。新清史认为满洲人“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换言之，实际上并不是，只是“打扮成”。西方学者往往把非汉人统治的政权视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征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征服者的王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外来政权”，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不是“奇谈怪论”的“大翻案”吗？我并没有说错啊！我曾一再“敬告”姚大力，洋人只认汉人是中国人，中国学问叫“汉学”，满人、蒙人、藏人都不是 *Chinese*，但老姚还是听不懂。所以我说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中国也是一多民族国家，然而姚大力居然莫名其妙地说我也不知道中国是一多民族国家，能够这样子乱说话吗？满洲族群像汉人一样具有血统观念，然经过长期的历史经验，最终成为“历史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满人或汉人都不宜被称作“历史民族”。满洲认同没有消失又如何？我曾一再提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两码事。中国人的省籍认同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不是吗？

姚大力说：“汪荣祖主张若非汉化，即成外国的说法”。请问我在何处说过这句话？此犹如洋人所说“把你的话塞进我的嘴里”（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将汉等同中国是西方人的主张与说法，所以他们虽然把中国历史上非汉人政权写入中国史，但视为“外来政权”或“征服王朝”。事实上，这些王朝无论五胡、辽金元清绝非外国，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仍然是中国。姚大力提到吕思勉，原来是要借吕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国。吕先生那一辈学者于辛亥革命后仍具浓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忘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更不应套用外国名词，把元代视为“殖民地时代”，因大元就是中国的国号，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忽必烈又称元世祖，也是中国的庙号。姚大力是元史专家，应该知道得更多。他也应该知道，即使吕先生虽不恰当地把元朝视为“殖民地”，但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不是吗？但他却以我认为写入中国史，就是把元朝视为中国，有违吕先生的本意。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日本殖民地，蒙古人到中国成立元朝，日本人并未到台湾成立和朝，两相比较就知道，说元史是中国被殖民的历史是不符事实的。然而台湾五十年被殖民的历史仍然要写入台湾史，不是吗？美国殖民时代也是美国史的一部分啊！老姚未免少见多怪矣！他更借此大玩文字游戏，莫名其妙说我“清朝若非全盘继承汉家传统，即失去代表中国之资格”。我在哪里说过这句话？我一再说过，所谓“全盘汉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假议题，我一再说过大清足有资格代表中国。认为清朝不代表中国的是新清史诸君啊！他居然还要反问我，“清朝到底还算中国吗”？此一大哉问，你应该去问新清史诸君啊！需要“错乱”地问我吗？

## 清、俄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国不能与俄罗斯帝国相提并论，因看起来都是“早期现代帝国”，但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理会，写了一大段来反驳。他接受俄国晚至十九世纪末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但同时又确定俄国是已奉行帝国主义的帝国。按十九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向海外扩张夺取资源、市场与劳力。请问若非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会有“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吗？无因能有果吗？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有其洞见，西方学者也未尝因人废言。即使不是“最高阶段”，也必须要有相当阶段才可能发生。姚大力问我“是不是社会发展五阶段的追随者”？这话在我听来相当意外，因我一直认为任何学说，只要具有批评的眼光，都可为我所用。学术不是帮派，谈不上“追随”。若具有批评的眼光，就不会将一偏之说视为“主流”或“定论”。如姚大力跟着有些西方人，将帝俄视为“专制的和集体的非欧洲帝国”，真不必人云亦云，何不独立思考一下：帝俄不是欧洲国家，难道是亚洲国家？即使可称“欧亚帝国”，重心还在欧洲吧！

说到“资本主义”（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资金牟利的经济制度，无论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是为了市场供需，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私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但纯粹的并不多，即使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与“控制”。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从一些译书中找些说法，在抽象的名词里打滚，作言不及义的解释。姚大力要“把克利欧还给克利欧”，那就请克利欧出来说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看十八世纪的帝俄是不是已进入资本主义。

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清帝国康熙大帝同时，已开始全面欧化，将俄国带入西欧世界。他在俄国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大大发展了纺织轻工业，输入各种新型的制造业，以及成长四倍的国际海上贸易。在1695年俄国只有十七家铁工厂，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发展工商政策的目的是，固然是要富国强兵，由政府主导，但至1725年乌拉地区（Urals）百分之二十的铁产已由私营，而早在1716年，高质量的俄国铁器已出现在伦敦市场。当彼得大帝驾崩时，俄国所出产的生铁已经略微超过英国，二十五年之后远远超过英国。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

世时，俄国已取代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生产国。从 1710 到 1725 年间，不少国营工厂转为私营，彼得大帝也以优惠条件鼓励创办私人企业与公司。其实他早在 1699 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开设各种不同项目的工商业公司，发展贸易与各类制造业，他也从大商人与制造业者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金来发展工业与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国的国际贸易额在彼得大帝任内已成长了四倍，且在整个十八世纪持续不衰。所以俄国东进到内亚与东亚以及西伯利亚，主要也是为了追求资源与商利。请问十八世纪的俄国有轻重工业、有各种制造业、有私有资本、有国际贸易与市场经济，以及有追寻庞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认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呢？在历史女神面前还需要引经据典来强辩吗？姚大力相信俄国晚到十九世纪末尚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太“冒失”了吗？他想送给我“冒失”的帽子，还是还给他自己吧。

反观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也在盛世，康熙大帝虽从耶稣会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讯息，对西学也发生兴趣，但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康熙经营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到乾隆晚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绝，就是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体制，被西方人称为“迟滞的帝国”（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入侵，李鸿章才惊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很明显的，清、俄虽同为“早期现代帝国”，但一进取，另一守成，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我说“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会意，只好再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史实，供他参考。

### 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是两码事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其实略观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胁是一贯的。明朝无力进取，只能筑边墙，做最保守的全线防御；清朝具有的长城以北以及内亚的优势，才能做进取的防御，建立满蒙“旗盟制度”，目的是和平相处，分而治之，以策安全，与西方的殖民制度，乃两码事。康熙征讨准噶尔蒙古，因噶尔丹破坏此一安全体系，入侵内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断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动机。就拿姚大力提出来的“义利之辨”来说，西方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几乎全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图？多的是劳民伤财，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清既然是为了北疆的安宁与安全，可称为“义”。无论如何，清朝在内亚的建制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制度，吴启讷在我所编书中已经详述，不必再赘，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于扩张动机的善恶固然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未尝没有公正客观的可能性，至少善恶有程度之别，我想姚大力也不至于认为大清的扩张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丘之貉。善恶也未尝没有一致性的判断，像二战前德国与日本的扩张，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说是“善”的。我说美国人都知道美国的西进运动，濮培德当然知道，但他却以双重标准来指责清朝的西进。姚大力未看懂，却指我说濮培德“不是美国人”！

姚大力显然对后现代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引福柯讲“话语”（discourse），但贸然引用，言不及义，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干。我既不曾说新清史是“话语构建”，也不认为是言之成理的“理论”，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确想要指出的，其实是所谓“实证史学偏见”，他要重“理论”轻“考据”。他说“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这不是废话一句吗？考据原是做学问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凭考据当然无法重建史实；然而如无严谨的考证，重建的史实能不“地动山摇”吗？

他又贸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话，不知上下文的读者有点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无法掌握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的要旨。柯氏反对的“实证史学”是指将史学科学化或遵循自然法则的史学，如布雷（John Bury）与韩贝尔（C. G. Hempel）等人的主张，因他认为历史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历史不可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运心重演往事，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仍然需要文献佐证。

他在自传里说得尤其清楚，解决历史问题必须要抛弃猜测，而须充分满足证据所需。在此不宜多谈柯林武德以免节外生枝，总之他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史学仍有敬意，考据也绝非“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据我所知，韩儒林就自西欧汉学中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与部落名。考据不能“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吗？

在西方，“学门”与“纪律”（discipline）是同一个字，学术纪律要求极严。进入学门的研究生需先学习该学门的基本学术规范，讲究写书评、写论文的方法与格式，连脚注的格式都必须按照规范，如有不按规范的书评或论文，是不会被接受的。所以我很惊讶有人会说，书评可以随便写。在西方教你如何写论文、写书评的小册子可多着呢。姚大力要大家虚心向外国学习，何莫从入门的学术规范学起？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高校是以“世间人法无定法，而后知非法法也”来教导学生的。

### 学术批评不是“打棒子”

我认为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见闻应是有参考价值的难得讯息，但姚大力认为这些“琐闻逸事”是八卦。若说“认识她”或“一夕谈”是八卦，那么“先师”、“老友”云云是否也是八卦？我犹记与他先师一夕之谈，是充满敬意的。姚大力引他先师所说“历史研究中自筑营壑、关门称大王的封闭意识，以为既然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文化，即可以旁若无人”，明显是反映他先师的时代。在那封闭的时代，当然是十分正确而令人起敬的。但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与港台一样膜拜西学之风大盛，是否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连研究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如人”的现象？儒林先生若见此现象，还会说“关门称大王”吗？作为韩教授的学生不自觉时间错乱，居然说我“先捧后抑”，不仅错解人意，而且还要杠上开花，加上“轻诬前贤”的罪名，还要牵扯到陈寅恪。在他心目中，“尺有所短”与“轻诬前贤”是同义词吗？

最不可思议的是，姚大力说“在他自己主编的书里也没有获得多少人支持”；如果是这样，他又何必批评我主编的书呢？批评我就好了。遗憾的是，他老兄既不知有水平的研讨会本来就不是“一言堂”，更昧于我们来回讨论、修改论文，编辑论文集的过程。我们既有不同意见，也有基本共识，像你姚大力当然不会跟“我们”一起开会、写文章吧！请问老姚，如果主编不能对他所编之书负责，又有谁来负责？如有人对一本论文集提出不当的批评，如果主编不回应，算负责任吗？他不了解这些情况也就罢了，居然在情急之下，口不择言。用他的话说，“是什么意思？”他出此下策，恐将貽笑儒林。我编的这本书出版后，欧洲著名出版社 Brill 主动来函要求授权出英文版。西方有人对这本书如此感兴趣，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见解和批评的力度，与姚大力的心态正好南辕北辙。姚文总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批评新清史，而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把批评他们当作“棒子打到新清史头上去”，学术批评可以等同“打棒子”吗？

政治正不正确也是姚大力提出的议题，我只是回复他，他便死缠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新清史重新诠释清帝国的性质，强调“族群主权”以及大清是内亚帝国而非中国的朝代，不应该有所警惕吗？当下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众所周知，目的就是“围堵”中国，不希望中国太强太大，难道姚大力毫无感觉吗？姚大力真的相信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图与新清史理论完全无关吗？他人在境内，应该对学术被政治利用更加敏感。然而他还要反问我：“那些当年和当下的敌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姚文理直气壮地说：“我说针对新清史的批评往往含有指责其‘政治不正确’的强烈意味，这么说到底错了没有呢？”错了！我们不会“指责”他们政治不正确，因他们根本不在乎政治正确不正确，我们只批评他们的立论，对他们的论述被政客利用感到遗憾而已。强烈意味的政治语言倒出现在姚文的最后一大段，诸如“把这样的争论看作学术领域内的一场政治斗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甚至发展为一种空言诋斥、辞气叫

嚣的恶劣文风，就可能带来非常不好的后果，不但无益于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对政治发展也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无限上纲的政治语言令我感到十分陌生与错愕，怎么会出现这种话语呢？谁会把学术当政治斗争呢？谁在“叫嚣”？与讨论新清史有什么关系呢？姚大力要我们去批评政客，不要“棒打”新清史，我想他应该记得一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能够在学术上也作些批评吗？“棒打”云乎哉！？

2015年6月10日写于林口寓所

## 【论 文】

### “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sup>1</sup>

——与欧立德教授商榷

汪荣祖

【《探索与争鸣》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在这次会议上，争论多年的“新清史”争论再起波澜，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与汪荣祖教授当面交锋，就“新清史”主要观点与“汉化”“帝国”等概念进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为了促进学术争鸣，全面呈现相关讨论，本刊特将上述二位学者根据发言认真修订的文章与论坛主办方负责人方维规教授的述评共同刊发，以飨读者。

#### “中国”何以成为问题

欧立德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思想与方法”高端论坛上提到“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意外，因为中国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从梁启超开始，超过一个世纪；在美国费正清开始带领研究中国，也超过半个多世纪，各自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并没有认为“中国”概念是一个问题。

欧立德教授（简称欧教授，下同）提到的现代中国学者，从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傅斯年、范文澜和钱穆等人的著作中，我也看不出他们在“寻找”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并没有认为这是问题，因为他们视为当然，中国就是中国。现在国外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葛兆光教授觉得问题严重，出版了《宅兹中国》这本论文集，想讲清楚、说明白。其实从文献看，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自称是中国，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其满文遗诏里，也自称是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历代皇帝应该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中国。

为何会提出“什么是中国”？而没有人会去追究“什么是美国”呢？中国的疆域是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而形成的，而美国只经过二三百年来就从十三州发展到今天横跨两洋的国土。时间上虽然差别甚大，但这两个国家的地理或空间，同样在改变。中国疆域演变的时间很长，所以葛兆光教授讲中国历史疆域起伏较多。欧教授要谈“何处才是中国（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这是在谈历史疆域。各国都存在历史上疆域的演变。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把演变到今天的过程说明清楚，这是个历史变迁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另一主因是西方人，不仅仅是欧教授，一直坚持把中国人等同汉人，他们心目中的“Chinese”，就是汉人，所以满人、藏人、维吾尔人都不是 Chinese。

<sup>1</sup> 《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https://www.guancha.cn/WangRongZu/2018\\_07\\_23\\_465178\\_s.shtml](https://www.guancha.cn/WangRongZu/2018_07_23_465178_s.shtml)

但是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多民族国家，而中国成为多民族的国家并不是近现代的事，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疆域内，经常存在多民族的交涉、交战、交融的过程，如史家陈寅恪笔下胡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事实上，今日所谓的汉人，已是多民族融合后的产物，而非一种血缘。诚如葛兆光教授提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大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使日本也有少数民族。但欧教授坚持满人不是中国人，在他英文版《乾隆传》里，直白地说“乾隆是一个非中国人的中国皇帝（Qianlong i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然而在中文版里却悄悄改为乾隆不是中国的汉人皇帝，瞒过了中文读者。

欧教授说乾隆不是中国人，但甘德星的研究指出：乾隆平定台湾的林爽文后，曾立满汉文十碑，汉文碑出自御笔，而满文碑译自汉文，颇多错误，显非原本，更非御笔，更进而证明乾隆是一极为汉化的中国皇帝，其立碑之举已反映其中国大一统思维，以“碑石性”彰显政治意涵。甘氏就实地实物，将满汉文并列，极有力反驳了乾隆非中国皇帝之谬说。

欧教授既然不把满人视为中国人，所以满清入关就是征服了中国，成了洋人喜说的“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用“征服”未尝不可，满清入关当然征服了当时的明朝，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很少有不用军事征服而成事的。但是欧教授心目中的征服是外国人征服中国，就像现代强权征服另外一个国家，将之并吞。这是比拟不伦。历史事实是：清兵入关是要跟明朝争中国之天下。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国以后，都是在争中国之天下，以统治中国。

我在点评欧教授的发言时，即当面指出满人和“满洲”这块地方对关内而言，并不陌生，不能视为域外，说不上是所谓的“异域（alien）”，因关内、外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按照史实，“满洲”的族类叫女真，女真族类，计有百余，主要有三：（一）建州女真；（二）海西女真；（三）野人女真。又有生女真与熟女真之分，熟女真几已汉化。“满洲”的发祥地主要是建州，建州到清朝成为兴京，也是爱新觉罗氏祖先发迹之地。

再从历史来看，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燕国将领秦开曾经击破东胡，设置了辽东和辽西两郡，辽东延伸到了朝鲜，辽西就是今天的锦州一带。汉武帝也设立了乐浪郡，就是今天朝鲜的平安道一带；汉朝的玄菟就是清代的东边道，位于兴京之东，长白山东偏的地方。明朝初年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有卫所，也有学校、教官。都司的东北为兴京，就是汉代的玄菟郡、辽东诸郡。明将熊廷弼跟努尔哈赤相持在沈阳、广宁。广宁，就在今天锦州的东北。当地人一样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明成祖永乐皇帝（1403-1424）设奴儿干都司，统辖建州、海西诸郡。清朝曾在黑龙江发现奴儿干都司碑，可以证实明朝统治势力不但到辽东，还扩展到吉林、黑龙江。

明宣宗（1426-1435）时，曾在吉林的松花江边建了个造船厂，所以清代有人称吉林为“船厂”。这段历史可以证明满人和“满洲”对明朝人来说，绝非陌生的异域。在明代，不仅是辽东，即使吉林、黑龙江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至于人口，据章太炎的考证，在明朝时，辽东的汉人已经有四、五百万人之多，到了清末，增加到三千万，而满人不到一百万。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纯正的满人最多只有数十万，许多满人已经掺杂了蒙古、朝鲜以及汉人血脉。入主中原以后，很多满人随之入关，经过两百年之后，到现在纯粹的满人已经非常之少。二战前日本人曾说满人有五百万，显然夸大其词。

## “汉化”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回顾历史，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多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平、融合，不断在进行，经过三千年的演变，逐渐形成现代的中国，斯乃历史发展的事实。我们注意到，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去不返，逐渐形成许多民族国家，而中国的疆域不下于欧洲，何以在中国各民族经几千年都没有形成多个民族国家，关键之一即在汉字。因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入侵或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只好

识汉字、习汉文，久而汉化。如果中国也用拼音文字，用自己的口语拼成文字，可能也会像欧洲一样，形成列国之势。所以中国虽屡经分裂而总归统一是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并不一样。

对于汉化，包括欧立德在内的新清史学者均攻击不遗余力，已故何炳棣教授因而有“维护汉化”之举，并非如欧教授所说，中国学者只想谈汉化。在讲稿完整译本里，欧教授还说：“如果中国的史学家只想谈论汉化，那么其他人，比如一个研究诺曼王朝时期英国的学者，或者一个研究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的学者，该如何参与对话？有谁关心他们能否参与对话吗？我们中国学人是否只有和同领域的人说话才感到开心？”这是很奇怪的假设。中国的史学家只想谈汉化吗？事实是因为有人否定汉化，汉化才成为议题。必须指出：汉化不是一种主张，也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少数民族汉化和汉人胡化，陈寅恪不仅讲过，而且强调此一史实，其结果是都成为中国人。

北魏孝文帝造孔庙，称孔子为圣人，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金朝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元朝建立更大的孔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教材，元朝的蒙古人统治者是在做中国的皇帝，死后用中国的庙号，仅名义上是蒙古的一部分；清朝入关之后，取代了明朝的政权，清代皇帝也取代明代皇帝成为中国的皇帝。清朝比明朝更为尊崇孔子，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颁发《御制资政要览》给各级臣工，在序言中明言要当中国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

他说：“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内容充满讲究德行的儒家色彩。“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通晓满文的甘德星，利用四个满文遗诏，指出康熙确实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雍正皇帝亦复如此，我在点评时当场指出欧教授在英文讲稿中误读了雍正，他说：“假如满洲人这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那雍正皇帝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发表长篇大论的《大义觉迷录》，来昭告每一个人？”我指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主要意思有二：一是要排除他取得皇位的不正当性，极力驳斥他失德的谣言。当时有出自他兄弟的流言，说本来康熙要传位给十四子，他涂改遗诏为第四子而继位。

他为何要澄清夺位的谣言？因为有德者为君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他要符合儒家伦理的正当性和皇位的正统，否则就成为篡位。第二是要强调“华夷一家”，来论证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讲得如此明白：满汉之异，犹如鄂湘人籍贯之不同。所以他的目的正是要消除欧教授所主张的“ethnic character（种族特性）”，这样清政府才能够成为中国的朝廷，拥有合法性。他认为谁主天下，是“有德者即有其位”。当时我还把《大义觉迷录》中最重要的一段念给大家听：“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雍证明说要为天下君，要做合法的中国皇帝。假如他不认同中国，又从何说起呢？遗憾的是，欧教授在完整的译本里坚持原观点：“如果满人真是如此‘中国人’，那雍正为何从一开始就殚精竭虑，试图通过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向世人证明这件事呢？”请问雍正要向世人证明什么啊？乾隆皇帝更经常亲往曲阜常住并祭拜，尊孔极矣。清末的慈禧太后主政四十余年，权力无双，却不敢像武则天帝制自为，应与儒教伦理的牵制，大有关系。

所以清朝的汉化，从中国历史看，一脉相承，并非新鲜事。汉化这一事实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又如何动摇得了呢？新清史承袭前人“内陆亚洲”理论，好像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内陆取代中原，极力去汉脱中，不免轻重本末倒置，颠倒了内外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现实。大英帝国的“内”不会不是英伦三岛，美国史家也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视野来写美国历史。

欧教授不愿意认同“清朝是中国历代的最后一个王朝（the Qing as the last in a long series of Chinese dynasties）”，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若将元、清两朝从中国帝制史中割裂

出去，是一种说得通的历史论述吗？当然每个朝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承继的关系十分明显。欧教授不愿意认同，但乾隆皇帝却非常认同，他在《历代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以便“知统系之应守”。他明明白白说：中国的历史统系延续到清朝。每个朝代交替之际，多有殉国者，元朝征服南宋固然有为宋殉节者，但是明朝征服元朝，也有为元朝殉节的汉人，清亡时也有殉清的汉人，足可说明对国家的认同是超越族群的。

欧教授总是认为中国学者常常会有“民族主义的论述（nationlist narrative）”，所以不愿意动摇旧的说法。欧教授特别引用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所说“动摇惯例（unsettling what is customary）”并将我反对新清史论者将满族视为外国人之说，作为应该动摇的例子。其实所谓“动摇惯例”在华语世界里就是翻案。翻案在中国史学传统中是常见的，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有充分的理据与事据，因此翻案有的成立，有的就不能成立，不能轻率地下断语，更不允许自以为是。

他认为“满族”、“少数民族”都是现代的用语，所以不能以今论古。所谓“以今论古”是指“年代误植（anachronism）”或时间错乱；假如不能用今语说古，那更不能用西方的词汇来讲中国史，那还了得？更重要的是满族与满人有何实质上的差异？将近三百年的清朝，满人不是少数吗？最紧要的还是欧教授再次强调满人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是外国人征服了中国。他说：“在我看来，有历史证据显示，不同地域都有长期的暴力反满运动，而汉人普遍瞧不起满人，认为他们低人一等，与自己没什么共同之处。考虑到这些，我们很难认为清的强制统治不是一场征服，一场在中国大多数人眼中的‘外来’侵略。”清兵入关后，确有抗暴行动。但古代中国每一个新的朝代取代前朝时都不稳定，其后才安定下来。这不能与现代的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相提并论。更多的历史证据显示，汉人支持满人政权，汉人不仅没有乘势反满，反而帮清廷平定太平天国。

## 习用“帝国”描述传统中国并无不妥

欧教授在他文章的最后部分大谈“empire(帝国)”这个概念的“知识考古”。欧教授指出将“empire”译成“帝国”并不恰当，而且为之“困扰（haunted）”。他对此词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被用来指称中国，考证甚详，提出“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这样的议题。他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我觉得相比之下，“帝国”这个词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欧教授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词汇。其实，许多洋词汇都不可能在传统中国找到同样的词汇，但并不一定没有类似或相同的事物。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洋人用“empire”来形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帝制或皇朝，自有极为相似之处，至少与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相似。中国皇帝始于秦始皇帝，自称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皇帝的国家是不是可以称为“帝国”呢？而且这个皇帝开启了三千年的中国帝制，虽无“洋”名，却有“华”实，中国学者于是习用帝国一词，有何不妥？

《马关条约》已用“大清帝国”，何不约定俗成？当然中华帝国或清帝国与西方帝国有共同点，才会被称为帝国，但也有极大的差异性，包括大清帝国在内的中华帝国并非舶来品，而是几千年历史经验所产生的实体。换言之，帝国有许多不同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近代的“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与古代帝国就极不相同。欧教授说，“许多中国史学家都能接受‘帝国’这个词，但却反对把基于中国的王朝看作‘帝国主义’”，这显然是带着近代“殖民帝国（colonial empire）”的有色眼镜来看清帝国或中华帝国。我所编《清帝国性质再商榷》一书所描述的帝国，不是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国，而是中华帝国的延续。

“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现代的现象，是列宁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峰的现象。在古代既然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帝国主义。所以在传统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

就特征和内容而言，清帝国俨然是中华帝国而非西方式的帝国，这也就是我“平实”描述的大清帝国。欧教授好像认为帝国一定是“帝国主义的（imperialistic）”；我认为传统或古代的帝国是“帝国的（imperial）”，与“帝国主义的”是两回事。

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近现代的事。所以我们说中华帝国或大清帝国自有其自身的内涵，不必同于现代西方的帝国；互相比较之下，异同自见。在近代西洋历史上提到的所谓“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最具有侵略性，诸如海外殖民、夺取资源与市场，都是新帝国主义的特点，传统的帝国当然不可能有现代帝国主义的特点。然则近代殖民帝国的现象，古代西方也没有。如果“帝国”不能用，“国家（nation）”能用吗？帝制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概念，我们的“国家”是指朝廷，我们还能用这个术语吗？我们还能讨论唐朝的“社会（society）”或宋朝的“经济（economics）”吗？因为当时也没有同样的词汇与概念。

用欧教授的话说，“我们如何证明用这一观念与相关术语去讨论 20 世纪前的中国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知识考古”下去，岂能不治丝益棼？于此亦可见，现代中国的“今语”颇多来自西方，或是旧瓶装新酒，如“革命”一词。现代人讲古人古事是会有陌生感的，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曾出版《历史像是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一书，不能随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但如果不能用今语说古，可能困扰更多。

欧教授的“知识考古”必然会涉及翻译的问题。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教授发现两种语言间有所谓“宇宙观的鸿沟（cosmological gap）”，很难完全跨越。

钱锺书先生也说，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意思会漏掉或流失，甚至会流失到面目全非，真的能够一五一十完全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非常不简单。西方理论性的用词当然更加难以译介。例如欧教授提到的“经济学”，“经济”在中国的原意是“经世济民”，应翻译成“statecraft”而不是“economy”，也不是“economics”，可是我们现在都普遍用后者了。“经济学”原本严复曾翻译成“计学”，但没有沿用下来。

西方词汇汉译，经常只能赋予较为贴切的词语以新意涵。我觉得完全可以用新名词写历史。由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威力，有许许多多的新词汇、新概念要译介到中国来，因为日本西化在先，有许多汉译照搬现成的日译，所以我们接受了很多日译的西方名词。翻译过来既然丰富了汉语词汇，为什么不能用这些词汇来描述历史情况呢？

欧教授提到，他看到的用中文书写的中国历史，除中外关系以外，没有提到当时的外国。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太过看重自己的东西，不太在意“他者”。我觉得正好相反，中国学者自五四以来对西方的仰慕是有目共睹的。欧教授若到两岸三地的书店去看看，琳琅满目，西方各种书籍，包括学术性论著，多有中文译本，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反观欧美出版界翻译了几本中文书，恐怕很不成比例。近年来中国人盛行翻译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欧教授为美国一般读者写的《乾隆传》译成中文后也在中国大陆一纸风行。中国读者关心用英语写就的著作，要远远超过美国读者关心用中文写就的著作。

欧教授一方面说中国不关心外国，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西方理论早已在汉语学界里大大流行了。在西方理论光照之下，欧教授又何以会忧虑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能和世界上无数其他民族的经验放在一起研究？平心而论，运用西方理论于中国历史没有严重的问题吗？大家不是早已发现有“以论带史”的问题吗？这不是说西方理论“与中国无关（irrelevant to China）”，而是不能“盲目采借（slavish borrowing）”。欧教授在发言时问：“中国到底想要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内，还是在外（Is China seen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stream of world history or outside it）？”他所谓的“主流”，往往是等同欧美的经验。

因人性受到历史、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不可能像自然界现象那样一致而无异议。若将一方经验普遍化，很容易流为文化霸权。欧教授引用一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话说：“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然而我很怀疑西方世界有

多少兴趣，把中国的特殊性“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去深入理解”。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环球史（the global history）”，现有的世界史或环球史，基本上是西洋史，或以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史。假如未来能够有真正的环球史，是否需要包括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内呢？

欧教授提到“中国学者擅长数据，西洋学者擅长理论”一说，诚如他所说，是“错误的二元论（dichotomies）”。其实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如不擅长材料何从建立稳妥的理论？如果只擅长数据，何以成为史家？两分法是西方的主要思维，往往不宜用来解释中国的思想。中国的阴阳概念，貌似两分，其实不能一刀切、两面光，阴和阳是相辅相成的。儒家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亦非“两元（binaries）”，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偏废。如硬要将中国的传统思维塞入两分法，无异如章太炎所说：“素无疮痍，无故灼以成痍。”

其实理论非凭空而来，西方的理论无不从其历史与文化的经验而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难道提炼不出理论来？不是要刻意凸显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出自不同经验的理论，方可比观互补。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告诉我们“心智之学”或“内知识”有异于“物质之学”或“外知识”，后者有“自主性（Subjectivity）”。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不一，不是如欧教授所说，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自然界的日出东山、夕阳西下，不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人文社会科学虽同样有客体，然而对客体的认知有个人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判断，会有不同的解释，也就会出现主体性。不过，主体性并不是“中心论（ethnocentrism）”，也非“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应如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是多元的，无分优劣，可以并存。

## 【报刊文章】

### 历史的主体性不能丧失<sup>1</sup>

——美国学者“新清史”的危害给中国史学研究的又一次警示

汪荣祖

为何中国崛起而文化仍然“入超”？为何学界仍然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原因在于学术话语权的丧失而由西方掌握。

#### 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

话语权的丧失，主要由于“主体性”的丧失。我们往往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称之为科学，特别在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极其昌盛，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其实人文与自然两界之间性质不同，取径各异。人们对自然界“客体”的认知，如日出东山，夕阳西下，是可以相当一致而“客观的”，不至于有不同的解释，因自然科学的客体不涉及个人思考，主体性自然排除在外。然则，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如声、光、电，是可以“普世的”，不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而不同。至于人文社会科学虽也有其“客体”，如罗马帝国衰亡、法国大革命等等，但对此“客体”的认知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就有了“主体性”。换言之，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

<sup>1</sup> 《北京日报》 2016-12-13[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5165.html](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5165.html)

谓的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才能说是客观。若然，就不能不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同一事实，但有不同的观点、解释与意义，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必见之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总之，人文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因有无可避免的个人承诺与价值判断。此一分界早在十七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那里就有详论。维柯将自然科学视为“天界”或“外知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心界”或“内知识”。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他提升了心智之学，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维柯以为心智之学属于“列国的世界”，亦称之为“人间世界”，显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纪以来专注自然科学与自然法则的趋势。所以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

### **新清史的核心理论，也不很新，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之母的历史学，当然有其主体性。近年来美国学者提出“新清史”的论述，否认清朝为中国的朝代，否认满族汉化，而认为满人有其民族国家之认同，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而已。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更强调所谓“满洲风”，认为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然而族群界线却愈来愈严。新清史论者认为汉化淡化了所谓“征服王朝”在历史上的角色，因而要去掉“汉化”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欧立德提出满族的“族性主权”论，认为其重要性在清代超过儒教的正当性。

正因为我们习惯“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不免有不少人将美国学者对清史的新理论，视为值得重视的新发现，更因新清史标榜取用满文资料，便认为根据汉文文献研究之不足，遂相信旧说或不足据，何不向新清史认真学习。其实，治清史者利用满文资料并非新鲜事，早已有之，然而研究清史汉文重于满文也是不争的事实。欧立德写乾隆传，大都取材汉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无关紧要的满文。而新清史的核心理论，也不很新，实不脱二战前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如果我们跟随美国人或日本人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观论述，即以别人的主体为主体，只好自失主体性，让话语权于外人。

我们若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认同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对自己的历史便会有主体意识，就不难发现清朝采用明制，创新无多，并刻意废除八旗中许多封建关系。因八旗不是认同族群，而是认同旗主，是一种君臣的封建关系。当满清入关称帝后，这种封建国体就不可能适应大一统的帝国。八旗共治、八王议政，与推选之制实有碍皇帝之至尊。欧立德以为八旗直到二十世纪始终是“纯正的制度”，岂其然哉！清帝崇儒，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何炳棣教授指出，清朝比汉人王朝更能代表正統的儒教国家与社会，说明了为何汉人社会精英诚心诚意效忠清廷。康熙真诚仰慕汉文化，雍正汉文书法流畅，乾隆文采风流，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家化的朝代。满族入主中原，清帝建都北京，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大批旗人内移，无论宗室、王公、官员，甚至一般旗民，难能不入汉俗。汉化的事实，新清史论者如何能否定得了？

### **在美国红、黄、黑、白都是美国人，为什么在中国，汉人才算是中国人？**

汉民族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吸纳非汉族文化与血缘。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面貌上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以至于连匈奴、羯、氐等名称也逐渐消失了。清王朝开创了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盛世”，大大拓展了中国的领土，并实施移民政策，大批汉族及其农业文化遂亦西播。

满、汉两族经过“同质化”而终于“同化”。带有满族血统的汉人增大了汉族的总数，而极

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趋向认同中华民族，到当下形成五十六族的中华民族。中国是统一之称，而“汉”乃对称。以中国为汉，不晚于齐、梁，而后有胡、汉之对称；海外诸国不闻中国，唯知有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不再以汉人等同中国，中华民族亦非仅汉族。然而洋人坚持其主见，只认为汉人是“中国人”，遂将中国人等同汉人，于是欧立德论定乾隆是“非中国人的中国统治者”，我们能盲目相从吗？其实，中国像美国一样是一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而且历史更为悠久。在美国红、黄、黑、白都是美国人，为什么在中国，汉人才算是中国人？

欧洲白人移民北美，建立美国，不曾闻印第安原住民有“族群主权”，境内各族裔也不闻有“族权主权”，而只有美国的国家主权，在上帝的名号下同属一国。美国学者论述历史之主体性实甚昭然，不仅见之于其本国史，且亦见之于他国史，双重标准遂即显露。由其主体性再提升为“中心论”，藉其文化优势而又形成文化霸权。请看美国主流史家陆卡克斯信心满满说，历史意识唯西方人有之，并引哈斯狂言：“印度、中国、波斯、日本诸国的可靠历史皆出之于西方人之手”。然则，东方国家岂不是要授历史话语权于欧美史家？

中国自五四以后，抛弃传统，倾心西化，自然科学的成就固然由循序渐进而突飞猛进，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主体性未能落实而一意追随西方，因文化、语言以及价值观的隔阂，终难并肩，唯有仰其鼻息而已，甚至中国历史也要仰赖西方诠释。所以，欲建立主体性，必须要借助于自备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使之不再是博物馆内的陈列品，而是具有生命力的遗产。有了主体性，才能具有批判眼光或接受、或修正、或推翻外来学说，或自建本土新说，斯其宜矣。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8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